

**Schoppa, R.Keith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读《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 世纪的浙江》

马方方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

一些西方学者受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著名的宏观区域学说的影响,运用区域系统研究方法来研讨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特别是社会史,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学派。“核心—边缘”理论是施氏学说的核心内容,它把各地经济、商业和其它人文活动区分为核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从而显示出各区域内部及区域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

《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 世纪的浙江》一书的作者萧邦奇(Schoppa ,R.Keith)也受此影响,以“区域模式”理论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纵横两个层面考察了从 20 世纪初到国民党政权统治确立这二十余年里浙江省不同经济区域精英的社会背景、活动方式、职业模式、流动趋势,以及在地方决策制订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地方精英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精英组成的机构在近代政治发展中的显著作用;精英的职能责任在这些机构中日益突显的重要性;精英社会参与意识的逐步发展,以及在特定的政治空间内政治认同的发展。

对于中国精英阶层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领域中外学者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并已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他们多是对某一特殊群体进行分析探讨,系统综合的考察尚不多见。中国地域广袤,各个地区之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状况都有一定的差别,任何政策、制度的实施在各个具体地区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以一定的微观区域研究作基础,探究群体与制度表现出的各种区域的和细部的差别,把宏观的具体把握与微观的具体论证结合起来研究,才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实貌。这本书在以上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借鉴。

作者开篇即对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精英”作了界定。所谓“精英”,即“那些通过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领导角色来控制公共政策的人”,具体包括:(1)在各种自治机构、政治联合会、法团等精英机构中具实际领导地位的人。(2)在特殊的非制度性决策以及在操纵危机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显然,他的这种界定更侧重于从政治作用上的考虑,把其划分为在专门性机构任职的职能精英和非行政型精英这两大类。

同时,作者明确了他所指的“政治发展”:总体上看,是指“发生在一个社会体系内的

各要素的联合统一体”(包括个体、群体、机构、当地政治组织等)。精英的政治发展就是指精英在政治上的相互依存性与复杂性。简而言之,政治发展过程是从初始形态到复杂的政治结构及现象的转型,它包含着原有政治结构的分化瓦解、以及制度化的重组。在浙江省,最明显的政治发展的现象表现在社会政治多样性的发展与分化。作者进一步引申出了“政治发展水平”的概念,即“体系内各要素的相互依赖与综合”,以此为不同区域间的横向对比作下铺垫。

这部著作一共是 12 章,外加导论和结论。正文章节可大体上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 1 章),从总体上概述了清末民初精英身份、角色、职能,观念发生的转变,以及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并概述了 20 世纪初浙江省政权的更迭状况,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社会背景。

第二部分(第 2、3 章),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作者以人的密度、区域位置、经济发展程度等为标准把浙江分为 4 个区域,即核心区内层、核心区外层,边缘区内层、边缘区外层。核心区内层是最高度发展的区域,以下逐次递减类推。作者以县作为考察区域社会变迁的基本单元,提出了地理生态环境与政治人文环境两个因素共同影响社会的发展的观点。此外,还对精英活动的舞台——地方自治机构作了一个总体上的概述。

第三部分(第 4、5、6、7、8、9 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作者通过大量详实的资料、数据和事例对各个区域的精英作了深入的分析论证。既在纵向上明晰了不同时期地方精英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社会功能、身份变化、角色职能等特征;又在横向上对不同区域精英的以上特征进行了相应的比较。

第四部分(第 10 章),主要论述了辛亥革命对社会不同区域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重新解释了这场革命的意义。

第五部分(第 11、12 章),论述了各地方精英由于其不同的地方利益需要所产生的政治联合以及派别对抗。通过对核心区外层精英集团的崛起与发展的考察,以及对精英在不同区域集团中力量的分化组合与力量对比的分析,揭示了国民党右翼势力逐渐控制政权的政治背景。

二

对一些主要的问题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是作者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通读全书,以下几个问题是作者关注的中心内容:

1. 精英与宗族势力。

我们通常所称的宗族势力,大体指的是与国家政权力量相对应的基层社会控制力量,也就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合形成的一种社会控制力量。江南是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通过分析,作者认为通常有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地方宗族势力的发达:(1)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经济的富裕为大族势力的产生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2)在贫穷落后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盗匪横行、治安无力等社会问题,于是,加强家族内部联合以形成防御力量就成为必要。

宗族组织作为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单元,在新旧观念交织的近代化启动过程中,表

现出松懈与延续两种不同趋势。一方面，宗族的发展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渠道，密切了城乡间的联系。随着社会阶层结构开放性秩序的逐步建立及社会流动的加剧，外出谋生就业的精英大为增加，从而使原有的宗族关系的纽带呈现松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宗族曾经荣耀的历史是精英自身发展的源头活水，因此，地方精英，无论是传统士绅还是新式知识分子，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传统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因此宗族组织又呈现出延续的趋势。而且，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对于功名和知识的尊重是地方一直不曾改变的观念。于是，这种返乡归根、光宗耀祖的意识随着核心区向边缘区的过渡表现得愈益强烈。

2. 地方自治机构。

清末民初是地方自治事业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对自治政府精英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重要的职能精英的概貌。作者对这一时期4个区域带地方自治机构及团体的发展演变作了一个总体上的考察。认为这些地方组织为精英参与广泛的社会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舞台，在活动中他们增强了竞争意识、集体意识以及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意识。通过分析认为，在不同区域行业组织近代化进程的快慢，程度的深浅，往往与其内部成员的构成、观念的更新、组织形式的演变、功能设置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尤指政治环境）变迁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相关联。

通过对各县议会议员的社会背景进行的详细的数据分析，指出在核心区议会中拥有功名的人数比例要少于边缘区。在核心区，由精英们组成的专门性组织和所从事的行业中，实际上是由商人、新式知识分子、传统士绅，以及绅商构成了其主体，而官则依靠这些精英管理社会事务，商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边缘区，政治控制力量表现为士绅和地方官员的密切联合，而商人阶层的地位却远逊于核心区。这反映了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深层的变动。

从这些组织机构的职能上看，核心区的自治组织职能更为广泛，包括教育、卫生、慈善等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精英利用这些组织表达其政治经济的目标和需求，其职能行为及政治发展在该区也表现最为显著。而在边缘区，主要的政治议题则是维持乡民的生计及地方的治安。核心区地方自治事业的发展要远远高于边缘区，这也是在边缘区出现的寡头政治现象的重要原因。由此说明，边缘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并未起到核心的作用。但作者同时指出，虽然在边缘区这种制度化的意识仍很微弱，但毕竟渐渐地改变着原有的政治形态。这也是政治发展的表现。

3. 精英的职业及流动模式。

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与社会流动的速度成正比的，地区原有的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流动的速度也越快。从年龄上来看，50—70年代出生的人即使离乡在外也深切地关注着家乡和地方，而在80年代出生的则关注较少。从时间上来看，清末在核心区，大批学生离家在外，在新式学校学习，而边缘区外出求学的学生则相对要少；辛亥革命后到20年代，学生和官员重返地方的人员核心区要少于边缘区。由此既可以看出地方精英在时势变迁中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可以看到精英本身的多样性差异，其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其去留的影响，以及边缘区

较浓的乡土意识和地方观念。

关于职业流动的模式，因地域的差异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在核心区内层，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呈广泛的流动趋势，法律、新闻、警察、军事等社会诸多行业都有较大的发展。总体来看是朝着多样性、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职业流动方面，核心区外层与边缘区内层的精英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军人职业的兴起。知识分子脱离农业的愿望，混乱的地方治安，地方士绅为建立有效的地方防御体系的努力，以及 20 年代频繁的战事都加大了军队对军人的需求。这些因素促使了大批知识分子产生了从军的心理趋势。在这里作者向我们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对个人职业选择的影响。

4. 官绅的作用及关系。

史学界较为流行的“乡绅支配论”认为，在近代中国存在着一个非官非私的“公共领域”，在地方基层社会，是由朝中有奥援，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所支配的，地方政权的施政也深受乡绅势力的影响。20 世纪初是公共领域的大发展时期，地方士绅利用自治权利，在教育、防务、赈济、公共服务、文化改革、城市建设甚至地方司法等领域扩张自己的影响，并且这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推动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官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密切关系，他们需要求得相互的合作以实现各自的利益。地方士绅把公共领域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基地，当他们非正式的政治行为受到国家权力的威胁时，官绅之间的冲突就会很容易爆发。“公共领域可能是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一个连续处，但也可以是国家和地方士绅冲突的一个爆点。”¹

作者考察了不同地区政府的介入程度，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因地域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结果及影响力。通过分析发现，在核心区内层，地方精英极为活跃，在地方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非常显著，而地方官员所扮演的则是“顾问”的角色，并且官绅对抗也相当激烈。这种对抗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着权力争夺的意味，但双方的制衡也使政治结构呈现出多样性的形态，而且包含着打破专制，促进政治民主化的进步因素。

但是在边缘区外层，以绅为主体的县议会成员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就相对缓和，绅受制于官的现象较为明显。官在维持地方治安、开展慈善救济、发展教育卫生事业等地方事务决策中起着主要作用，绅士则相对缺乏自主性和独创性。这里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一些精英既任职于官府又居于士绅的核心。兼任官绅既反映了官绅关系的相对融合，又因其体现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现象说明了当地制度意识的淡漠以及有效的地方监督体制还尚未建立。从而以充分的理由说明边缘区的地方自治组织实已成为“国家”与“社会”、行政事务与公共事业的混淆。

5. 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城市具有辐射农村，带动农村发展的潜能。就核心区对边缘区的经济辐射力上看，核心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将外层视作原料基地或投资基地，工业资

¹ 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本对农村的投资，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为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而且对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起着重要作用，即为外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并成为边缘区精英流动的主要去向。而边缘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则对中心区的商人形成强烈的利益诱惑，由此也带来了边缘区精英社会心理的变化：一方面，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意识到了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使自身所处的劣势。从不甘落后的心理到产生变的意识，再到开始注重加强同等条件地区的联合，以及在联合中逐步提高的政治觉悟，这些都可视作政治发展的生成因素。另一方面，核心区的商人投资于边缘区，就引起边缘区士绅的不满。他们开始逐渐自觉地关注地方的政治经济利益，阻止城市向乡村的渗透。这实际上反映了边缘区精英们既希望发展当地与核心区的联系，以扩展地方经济，同时又对依靠外人产生怀疑的极为矛盾的心理。

从总体上来看，核心区地方精英的排外心理较强，而边缘区精英对异乡人的态度则是“共生共存”。在边缘区，行政边界的意义已逐渐消失，而行政疆域的形成更来自于居民对一个特殊群体的归属意识。由此可见，边缘区精英的文化政治区分意识并不十分强烈。

6. 辛亥革命的影响与意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史学界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是“新瓶装旧酒”，革命后的中国只是国家机器运作系统形式上的更新，而非有实质性的变化；而有的则认为革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促发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也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应该说，革命本身所传达的更应该是一种新的理念，其意义也应该以这种理念的深入程度作衡量。作者在这里并未妄断是非，而是通过分析不同区域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差异及辛亥革命在不同区域的影响力重释了革命的意义。这样，实际上使我们的认识更加符合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

通过分析认为，在核心区，具有爱国思想的绅、绅商、新式学校的教师及学生在革命前就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国民运动，后又通过各种形式参与革命活动，或与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曾经是清末改革派的中坚，后来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在革命中，精英们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协作意识。革命对核心区的影响，包括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诸方面的变化都是相当深刻的。应该说核心区是革命影响最为深入的一个地区。

但革命的本身及其影响并不具有统一的模式。即使对于处于核心区的绍兴和台州的精英来说，革命加剧了地方的动荡，盗匪乘机兴风作浪。他们几乎对革命感到完全陌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应该做些什么，以及由谁来领导，一些地主甚至组织佃农来进行防御。

在边缘区更是如此，军队和土匪不断制造地方动乱，由传统精英组成的自治政府支持领导下的军事组织，关注更多的是掠夺财富、争夺权势，传统士绅与新式知识分子的权力之争，忠于政府者与革命者之间的流血冲突也是不断发生。由此而看，因革命而加剧的人们不安和恐惧使有些地方的精英对革命产生了极端仇恨的心理。

但是毕竟，随着核心区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剧，为边缘区的精英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精英的职业模式及相互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相互的交流中对边缘区渗透进了“求变”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实际上为以后更深层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思

想前提。由此可见，革命对一些中心城市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则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缓慢的思想渗透。

7. 精英与地方政治的模式。

最后两章突出了作者所关注的主题，即精英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者再次对从清末到民初议会的组成成员的背景、构成及流向作了一个总体上的考察。通过分析认为，从民初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些精英们的社会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希望发展经济的思想情感是交织在一起，并行发展的。

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促使精英走向政治联合。“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与“金（华）—衢（州）—严（州）—处（州）”两个联合集团的建立，分别代表了核心区内层与外层不同地方利益集团的正式形成。作者考察了他们各自的形成过程、发展状况、政治主张、相互之间的政治对抗，以及在政治不断变换的环境中的应对策略和方式，并且对精英在不同的区域集团中力量的分化组合与势力对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作者尤其对“金（华）—衢（州）—严（州）—处（州）”政治联合集团给予了关注，指出这是杭州唯一一个地区联合组织。就其形成原因来看，主要是核心区内层的精英在政治决策、资源流通和资金分配等诸多方面都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从而使核心区外层的精英处于劣势地位。尽管外层对内层的精英有着政治上的附属意识，但他们也希望通过加强自身的联合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理想。作者以此作为铺垫，揭示了国民党右翼逐渐控制政治局势的社会背景。对右翼国民党胜利的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可以使我們更加理解国民党胜利的政治本质。

三

该书以区域理念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社会精英自身转变与社会政治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内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理论建树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 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尽管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的精英阶层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这种区域比较的研究方法实乃首见。作者在搜集和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一定时期、一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入手，考察其历史变迁的具体特征，再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论述地区发展的独特性及差异性。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中，作者从社会精英群体的交错流变及其与政治变迁的相互作用中去剖析中国社会，将区域的分析与历史的分析结合起来，建构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体系，不仅兼顾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区域理念构架，而且把静态与动态的分析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正确地处理了大背景轮廓地勾勒与历史发展线索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使近代中国精英群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化，结构上也进一步深化。时间上的前后承继，空间上的交错互动，给读者一种强烈的立体感。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使我们对许多似乎已成定论的历史问题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思考，并以新的更为客观的角

度对历史进行再审视，从而使我们的解释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

2. 体系上的刻求和严密。

作者最后指出，“核心—边缘”的区域分析模式是本书进行分析的主要模式，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这并非一种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模式，甚至在其选中的特定区域也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地域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结构，然而在地域及经济上的从属有时并不等于政治上的从属。例如余姚在经济上与宁波表现出更多的依从关系，但在政治上却与绍兴同声共气；嘉兴与上海有更多的贸易联系，湖州从属于杭州的贸易体系，然而从政治上看，这种定位却恰恰相反。这些作者在书中都给予了强调，即在阐述规律性的同时，并非忽视了个性的存在，也并未淡化细微处的价值与意义。

3. 社会发展合力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

施坚雅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地理和运输技术的决定作用，当然我们无可否认这两种因素对形成区域差异的重要影响，然而由此而忽视制度文化等生产关系的因素也未免失之偏颇。作者跃出了这一框架，分而论之，在立论方面具有重大的突破。

以社会发展动力而论。在核心区，经济的发展是政治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动力，而政治环境则对社会变迁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在边缘区，其发展的动力更明显地体现为一种政治上的影响。政府的官办组织逐渐地渗入原有的顽固、单一的寡头政治结构，从而渐渐地改变着社会制度的模式，以此引起社会结构的错动，以及人们逐渐萌生的“变”的意识。这成为更大变革的前提。

这里即是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互为作用的，即地区特有的人文环境及政治环境对地区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固然，交通工具的发展与改进使人口和物资的流动大为加快，且使核心区的可接近性大为增加，辐射域扩大，在逐渐扩大的城乡交流中新的文明与政治理念逐渐渗入乡村腹地，而且也在改变着原有的城市布局及社会关系。但不能忽视的另外一方面，正是一些突发的政治事件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的变化形成了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特定的区域体系特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进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是相互作用，共生共存的。作者在这里将二者很好地“综合”起来，强调一种社会发展的“合力”作用，从而使其解释更具合理性。

4、分类研究的最为困难之处，在于要对所述对象进行一种总体上的把握和了解。而且制度本身缺乏一种规范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区域中，地区之间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利益关系。就精英自身来看，在社会转型时期，既有旧的因素在惯性作用下的继续发展，又有由于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结构性调整，从而使其自身在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要对这种种多变性因素进行合理地糅合并非易事。作者吸收借鉴了比较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恰当地综合运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创见开拓的意识以及总体上相当强的把握能力。

通读全书，受益颇深，但也感到一些未尽明了之处。例如作者曾分析说经济落后，治安

混乱的边缘区也是产生大的家族的一个重要地区。在考察寿昌和汤溪等边缘区的几个县时，作者认为这几个县并无强大的家族势力，而且精英的结构也相对宽松。如此来看，当地精英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应该较为活跃。然而，汤溪县有 155 个地方精英，可在其两个主要的非行政性市镇中却只产生了两个职能精英，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地方家族只是对商业活动感兴趣。应该说，既然能成为地方的大族，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也是不言而喻的，从事商业经营也是情理之中，这对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不但无影响，反而可以说是其从政的一种必要的基础。作者在此似乎是把从商与从政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对特例的叙述只是简而论之，并未能对其背后隐藏的或然性因素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给人一种模糊而且矛盾之感。

此外，作者在叙述边缘区外层的章节中说，地方精英缺乏自主性和独创性，多受地方官员的控制。然而又分析说精英视衙门为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许多精英参与到衙门中来，而且一旦在衙门中，地方精英却能够控制行政官员。衙门作为地方政府与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代表协商的主要中心，实乃政府权威的重要工具。那么，士绅是如何在官方政治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在衙门中官与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民初的衙门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如果是属于官方执政机构，地方精英的参与是更多地代表着官还是民？此间尚有许多疑问，甚感疑惑。

总的来说，作者吸收借鉴了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模式并将之合理地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来，对近代的精英阶层在政治层面上曲折演变的具体历史特点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从而为我们勾勒出了近代浙江精英及政治发展模式的一个清晰的轮廓。该书堪称是将施氏学说用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收稿日期：2005-05-30

作者简介：马方方，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